

0 导 论

0.1 选题和文献回顾

2001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国有股减持这一话题在经过一年多的沉寂后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相比一年多前因中国嘉陵和黔轮胎这两家公司的国有股减持产生的市场反响，本次减持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恐怕是出乎管理层的预料之外的，一直维持在高位上进行观望性盘整的沪深两地股指呈现出折头向下的走势，8 月 1 日，沪指狂泻 108 点，更创下了近期内单日跌幅记录。一时之间，国有股减持流通成为市场争论焦点，对《暂行办法》更是众说纷纭，高唱赞歌者有之，痛下诋词者有之，平心静气探讨者有之，各执一词争论者亦有之。其实，2001 年作为新世纪的第一年，早就注定了是中国股票市场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早在这年 2 月，B 股市场向境内投资者开放的政策出台，AB 股市场并轨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已经在 B 股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巨浪；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 143 个成员，更使我国股市今后的发展成为群相瞩目的话题；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出台，更将这种巨变推向了高潮。可以说，以国有股

减持方案（尽管只是“暂行”的办法）出台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开始，又需上溯至 1999 年，具体说明见第 2 章）。就历史角度看，我国股票市场在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到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自己的运行框架和市场体系，今后的发展将更趋向于从增量创新主导型的扩张型发展转向存量调整主导型的纵深化发展，而目前正处在两个发展模式、两条发展道路相互交接的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对我国股市二十年来的结构发展和市场变迁做一回顾和理论总结，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更进一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 1978 年至今，也已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改革还将如何深化和继续推进，是目前我们要解答的头一个重大课题。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股票市场本身就是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包含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逻辑，其发展方向也是对我国改革下一步往哪里走的一个重要启示。通过对股票市场的结构和变迁的考察，我们可以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逻辑有一个深入的体会，对其今后的走向有大致的认识，这对经济体制整体而言，具有一种典型个案研究的意义，窥斑见豹、食髓知味，整体的认识正是通过这种个体分别认识和典型个案研究获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股市的结构和变迁的研究就成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以改革全局为着眼点的股市变迁考察，则为一般的股票市场研究增添了经济意蕴和全局性视角。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与笔者的取材和视角相似的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只有以下几种：张育军^①在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发

参见张育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展历程时首次引进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主要是诺斯的标准制度变迁模型，参见第 1 章），并将其作为证券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石。张的研究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但其理论发掘的深度不够：不仅标准制度变迁模型的正确性为诺斯本人后来所置疑，并且这样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现状和股市发展，也仍是值得怀疑的一个问题。胡继之^①在考察中国股市的演进与变迁的过程中基本上沿袭了张育军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构架，胡的贡献主要有两点：1. 涉及到股市的结构问题，尽管只是浅尝即止，2. 资料详实丰富，尤其在深圳交易所方面。两人的研究都多少存在理论和实践考察相脱节的弊病，对理论的掌握和介绍也仅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次上，在对实践即我国股市发展历程的考察中存在着就事论事的毛病，未能将之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上和一般意蕴上。张杰^②在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的考察中较好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考察的融合，该研究在观点论证的透辟和深入也为近年来金融学界所少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张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股票市场这一领域，从而使其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完整性。刘波^③在对资本市场结构的考察中比较深入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该研究涉及的范围之广和分析之深刻，也为近年来所少见，但刘的研究（限于选题）缺乏一种对中国股市发展的全局性的把握，在结构安排上也稍显凌乱。余运九^④在对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考察中将经济转轨因素设定为制度背

参见胡继之：《中国股市的演进与制度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参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参见刘波：《资本市场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参见余运九：《经济转轨中的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景，从而使其考察与经济的转轨和发展更好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其宏观微观并重的结构安排也显得较为合理，但其更侧重于微观领域的视角使其研究稍显凌乱，也难使人对市场的整体发展有一大致的理解。周颖刚^①在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效率研究中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曾有一个专门性的考察，其将股市发展和我国经济改革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也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其对中国股市的三阶段划分在依据和合理性上还是值得商榷的^②，而且限于研究重点，对股市结构的考察也不可避免地遗漏了。其他如李扬和何德旭^③、李扬和王国刚^④、许崇正^⑤、陈浩武^⑥等的研究，更多是一般意义上的介绍和评论，缺乏透辟的论证过程和理论总结运用。

理论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如上所述，这应该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对之进行比较透辟深入的研究，不仅在实践总结上具有重要意义，就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必要性。

0.2 理论依托和研究方法

本书的理论依托主要是基于制度的分析范式和这一范式与中

参见周颖刚：《中国股市效率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② 周颖刚的阶段划分参见其博士学位论文（2001）《中国股市效率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曾与周本人多次讨论，并合作形成论文（参见《福建金融》2001年第8、9、10、11期），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论文的形成在2001年年初国有股减持方案尚未出台之前；2001年6月22日《暂行办法》出台及此后围绕国有股减持产生的一系列纷争和波折，标志着市场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笔者在本书中的市场阶段划分与周存在一定的歧见。

参见李扬、何德旭：《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李扬、王国刚：《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许崇正：《中国资本形成与资本市场发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 参见陈浩武：《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国转轨经济结合形成的过渡经济学。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制度不断变迁，经济持续演进，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着眼于历史变迁和动态分析的制度分析范式无疑是最适合我国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从制度经济学那一面看，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变迁时期也正是其得到用武之地的時候。而着眼于将制度范式和中国经济转轨相结合的过渡经济学是中国学术界将西方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轨现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它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经济學阐释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同时，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基石，马克思客观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作为“不言自明的潜在知识”贯穿于全书始终的。

目前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数理化和实证化研究，其共同特点是科学化和反人文化倾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学倾向都遭到了比较大的忽视和冷遇，制度分析范式作为社会化研究的代表之一，其非主流地位甚至是其代表人物如科斯也公开承认的。对于学术范式的优劣比较，笔者认为并不一定要强求“定于一”，多种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学术范式的同时并存正是该门学科兴旺充满活力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数理化研究诚然有精确化、规范化和形式化的突出优点，其作为理论体系所呈现出的不逊色于物理学的优美形式也值得称道，但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社会学科而言，其最大弊病在于机械性，毕竟，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科学，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着眼于人的因素，——经济理论也不会象物理理论那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可验证性（证否），这也给数理化研究范式以标准缺位的危机。诚如德鲁克有所夸大地指出的，“当

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①。

“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缺憾需要新的回归社会学根本的分析范式加以弥补和完善，正如德鲁克说的，“下一种经济学也许试图再次兼有‘人性’和‘科学’两个方面”^②。制度范式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的。科斯公开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的那种经济学”^③，埃格特森则具体指出：“经济制度涉及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建立和实施效果两个方面。因为这些规则的建立和实施是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结果，所以研究制度的变化显然必须打破法律和经济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自成体系的研究领域”^④。正是制度范式对经济学人本本质的回归，才使得它比主流经济学获得更强的经济现实解释力，——尽管它在形式化模型的构建和数理分析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缺口。显然，无论是主流范式还是制度范式，在理论体系及具体应用上都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其同时并存的客观状况也反映了各自的存在价值。考虑到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具体适用程度还有待于提高（数理模型的构建在理论体系的建设上自然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其直接经济现实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实证研究则因我国实证期间不够长、具体实证数据存在相当大的水分而难有大的实际意义），基于此点认识，笔者将研究的理论依托定位为更具社会化倾向的制度范式和该范式与中国过渡经济相结合的过渡经济学。

参见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见《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参见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见《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参见科斯：《新制度经济学》，见《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则表现为宏观和微观并重，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未来展望并重，资料整理和理论分析、逻辑推演并重，政策评论和政策建议并重，跨国比较借鉴和制度的中国适应性、可行性研究并重，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并重。

0.3 结构安排和主要贡献

本书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首先回顾了作为全书分析理论基石的制度分析范式，以之作为全书论述的理论依托；其次回顾了制度分析范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即所谓的过渡经济学；最后阐述了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两个基本范畴，即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过渡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本章在逻辑上体现为一个演绎的过程，并为后文的具体论述构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归依。

第2章，首先考察了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迁，继而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角色的变迁，最后对我国股市的结构进行初步论述和说明。这在逻辑上体现为一种逐步推进的演绎过程：社会融资制度的变迁是股市角色变迁的背景性过程，股市角色变迁则是股市结构变迁的基础，在视角上表现为由宏观而趋向微观的渐进转换。这一章重在股市发展历史的理论提升和一般性含义的阐发。

第3、4、5章则是基于现状考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具体探讨，具体而言：

第3章，对股市增量创新的论述。本书将存量和增量的划分作为区分不同市场发展、不同市场举措的分界线，以此来对纷繁复杂的股市事件进行分类和归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本章按照市场结构的狭义含义（层次结构）—市场结构的广义含义（投资

者结构—投资中介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结构）这一顺序进行，以期做到层次分明、结构清楚。

第 4 章，对股市存量调整的论述。基于对渐进式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理解，笔者将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划为从以增量为主的前期阶段向以存量为主的后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存量调整和增量创新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对存量调整做一论述。涉及的主要有国有股流通、A/B 股并轨以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证券中介机构重组整合、监管结构体系完善等。

第 5 章，从立足于股市本身的分析超越出来，主要着眼于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对股市的发展和变迁做基于经济改革整体进展的考察。换言之，本章试图将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变迁置于整个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期使“中国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变迁”这一课题研究获得更广泛的经济意义和更深刻的理论内涵。

第 6 章，简短的结语，就目前广为争论的一些话题如规范与发展等陈述笔者的观点。

本书的主要贡献（或说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将增量和存量分类研究的方法引入股票市场研究，从而使纷繁复杂的股市事件在这一规范下得到比较好的梳理和归并，进而使全书呈现出比较强的逻辑严密性和结构层次分明感。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笔者将股市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具有比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

2. 将制度分析范式（而非标准的制度变迁模型）引入股市变迁和结构分析，使理论和现实具有较强的逻辑相关关系，也使本研究的理论层次得到提高。

3. 结构分析和整体分析并重的研究方法。作为市场整体的制度变迁是通过其结构的变迁得到实现和体现的，作为市场构成

成分的结构，其变迁和发展又是以市场的整体变迁为背景和基础的，二者表现为局部和整体，全局和（不同）角度的关系。本书的特点在于以市场整体演进的描述和阶段划分来勾画结构现状和变迁历程的背景（第 2 章），以结构变迁历程、现状的描述和进一步变迁的预测来体现市场整体的演进历程和继续演进的方向（第 3、4 章），从而使全文体现出一种逻辑上的紧致性。

4. 在充分、翔实地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变迁经过和演进逻辑的基础上结合刚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提出股市变迁的“三阶段论”并以之作为理解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典型案例，从而对纷繁复杂的股市发展道路做了一个明晰的概括和理论提升，并对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进行了逻辑意义上的归纳和探讨，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5. 做到了立足于股市而又超越了股市，使股票市场结构变迁的更一般的经济变迁意义得到一定的阐发，使股票市场变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的意义得到一定的体现。

6. 在详细分析、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已出台政策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政策措施（如国有股减持方案）出台伊始，就对其进行比较深入、中肯的探讨，并对其实施效果和演变趋势进行了大胆的预测，而这些预测又基本上为后来事态的演变所证实。在对已出台政策进行深入考察和效果分析（或预测）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1 渐进与激进： 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和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就其整体变迁道路看，堪称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因此，要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结构和变迁，首先必须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道路选择和变迁途径做一深入分析和考察。

本章首先回顾了作为全书分析理论基石的制度分析范式，以之作为全书论述的理论依托；其次回顾了制度分析范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即所谓的过渡经济学；最后阐述了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两个基本范畴，即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过渡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本章在逻辑上体现为一个演绎的过程，并为后文的具体论述构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归依。

1.1 基于制度的分析范式

在古典—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下，制度因素一般来说被视为给定的背景性常量而置诸分析论述的范围之外，这一缺失使所谓的

主流经济学（尤其是马歇尔之后）在解释经济的成长变化和社会进步的累积作用时显得无从措手，因此，对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过程和原因的探讨被摈于经济学“主流”之外；这一方面为经济学理论的形式化和一般化排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类似于经典力学的“建立在虚幻的自行均衡状态假定下”（凡勃伦，1899）的一门“结构主义”科学。经济学理论的这一发展为一些有识之士所不满，他们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乃至一切“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为更重要的研究对象；“制度”这一久受忽视的“黑匣子”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经济成长和结构变迁的过程阐述和动因探索对于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丝毫不弱于市场供求静态描绘；广至国家兴衰嬗递，微至企业产权结构，都应该，也可能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这些学者因其对制度因素的重视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根据时代先后、思想演变和体系构建又可将之分为三个群体：旧制度主义（Old Institutionalism）学者，后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学者以及新制度（New Institution）学派^①。在一般的经济学说史（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等）中，“旧制度”和“后制度”的严格区分并不存在，而只将二者统称为“老”制度主义（Old Institutionalism）。这是因为二者从思想倾向到研究方法上都十分相似，在理论渊源上更是一脉相承。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后制度主义学者更“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

前二者之所以不能称为一个“学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虽不乏创新，但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上并不如人意；对很多制度主义学者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甚至是其着力避免的，用朗鲁瓦（1986）的说法，他们“想要制度的经济学，而不要理论的经济学”参见 M.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隐蔽在人和社会的生命过程的先验概念中的实用主义的和工具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①，因此，其理论的具体涵盖和内容与旧制度主义并不完全雷同。尽管如此，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学术演进上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分野（一些 1940—1950 年代的制度主义者往往不能具体说明属上还是属下），因此笔者在此将之合并统称为“旧制度主义者”。

1.1.1 旧制度主义学者的思想

凡勃伦是制度主义的先驱，是第一个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研究基础的学者，他主张“从制度的分析出发，以建立经济学体系”^②。凡勃伦对与他同时代的逐渐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分析范式极为不满，他认为“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③，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适应任一发展阶段的所谓“常态”，因此，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研究制度演变过程的“进化论”的科学，而非简单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凡勃伦（1898）倾向于用原因（而不是目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32 页。

旧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学者虽然未曾建立起完善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思想的深刻和独到即便是对之极端轻视的新制度学者也无法否认；新制度学派的许多理论源头也须追溯至凡勃伦、康芒斯等旧制度主义学者。可以说，没有旧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学者的先驱性研究，新制度主义学派必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在阐述制度分析范式时对这两者的介绍就是重要而必要的。

参见胡寄窗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9 页。

凡勃伦（1899）：《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38 页。

的)来理解有序不断的制度变迁,“从发生学的角度把握正在展开的过程”^①,因而他认为制度是人们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直接与人们的心理活动相关;而制度变迁则是一个“累积因果”的过程,是“对环境(变化)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②。“累积因果”的思想类似于生物演进,其一个明显的推论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性,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后发生的事强烈依赖于当前的具体事态,而当前事态又是此前事态的结果”^③,于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凡勃伦的这种复杂系统演进开放性的思想萌芽成为诺斯等的路径依赖理论、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和正在形成的制度动力学^④的理论先导。凡勃伦的思想虽不乏新颖和启发性,但诚如胡寄窗(1991)所指出的,他对所论述的对象常是“抓住事物的某一方面肆意攻击或大肆宣扬”,在经济理论上“从未提出足以代替的理论内容,只破而不立”^⑤。因此,称他是一个“学派”的开创者并不妥当。

与凡勃伦相比,康芒斯是一个更严谨的经济学者,他在《制度经济学》(1934)一书中对传统经济学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并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尽管如此,康芒斯在对制度作用的强调与凡勃伦并无二致,他认为,人设立一套“习惯假定”(制度),并“用它们来为常规交易提供基础”,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12页。

②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139页。

转引自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120页。

综述性文献参见M.J.拉齐斯基(Radzicki):《制度动力学决定论的混沌及自组织系统》见R.H.戴(Day)等合著:《混沌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胡寄窗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第252页。

从而使“日常工作不需要经常的思考就能够自然进行”^①。但康芒斯不同意凡勃伦根据新物质条件形成习惯的观点，他认为制度产生于经济稀缺事实造成的困境，这就使得康芒斯与传统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有了共通和交流的基础。康芒斯构建了一个以交易概念、现行的关系或组织，以及运行规则为基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规范和其他社会规则在解决冲突、提供安全及增加可预见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康芒斯以交易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着重探索法律及其他规范对交易的进行及资源配置的意义，这使他成为新制度学派中科斯——波斯纳法律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先导；康芒斯还区分了“立法机关有意识的决定”导致的规范（制度）变迁和“习俗、普通惯例以及法院在解决争议时所作的裁决”导致的变迁^②，开后来新制度学派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划分的先河。事实上，新制度学派的许多基本思想和理论体系是康芒斯思想的发展和系统化，因此，相比凡勃伦，称康氏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先驱似乎更为恰当^③。

米契尔在对经济周期的考察中不采取传统经济学者的均衡分析范式，而是从整体经济活动的经验探索中寻找经济波动的内在不稳定性，这正体现了重视“制度”和“流行的社会习惯”的凡勃伦传统。但米契尔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不同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外在动力说，他认为，“制度系统可能包含相冲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可能造成系统新的、预见不到的变迁”^④。

艾尔斯继承了凡勃伦的制度变迁思想并对之进行理论总结。

参见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 72 页。

^②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 120—122 页。

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学派的最高奖便是以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

^④ 参见许文彬：《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学分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21 页。

他认为制度与技术是相关的，与此相对应的价值判断被划分为工具价值和礼仪价值两个体系，前者与技术相联系，后者则是制度传统的体现；二者的矛盾冲突推动制度变迁的展开。具体而言，当技术变化在给定制度结构中尚存在活动空间时，礼仪支配指数不发生变化，制度变迁不会出现；而一旦新的技术变迁突破了现行的制度结构，从而使两个价值体系产生矛盾冲突时，这种“能动和动态的技术创新”就会导致“流行思想习惯的改变，从而制度变迁得以实现”。这一观点与新制度学派中舒尔茨等人的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制度主义传统因其理论的零散不成体系和分析过程的不严谨性，在 1930—1940 年代沉寂一时，备受经济学界冷落；至 1950 年代才（主要）由加尔布雷思重振旗鼓，形成后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加尔布雷思是后制度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乃至“好立怪论”的论述风格与凡勃伦都极为相似。加尔布雷思坚持了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运用历史和演进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传统，他坚信，微至个人的行为和感觉，广至宏观经济现象，都必须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起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以之考察“社会制度及相互间的作用，和支配它们发展的规律”^①。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凡勃伦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思想，并结合当时盛行的企业家职能概念，提出“技术结构”（Techno-structure）概念，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专业的技术知识已成为决

参见 D. 赖斯曼：《爱唱反调的经济学家：J.K. 加尔布雷思》见 J.R. 沙克尔顿、G. 洛克斯利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定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于是，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正逐渐由原来的出资者（股东）转移到实际经营者（经理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手中，企业的经营动机也随之发生相应转变。加尔布雷思的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实开后来新制度学派微观理论（公司理论）体系的先河，而 1980 年代盛极一时的委托一代理理论也可从中找到理论源头。加尔布雷思还提出“抗衡力量”、“二元经济”概念，指出强大的组织力量（如大公司、工会等）正逐渐替代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使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机制自动趋于均衡的观点不再切合实际；实体经济事实上已被分为组织内的“计划体系”和组织外的“市场体系”两个部分，二元的对峙和竞争构成了现代经济的基本特点。尽管缺乏理论上的适当总结和抽象化及完整体系的构建，在加尔布雷思对上述两个概念的描述中我们仍可看到奥尔森（分利集团斗争推动制度演变乃至国家兴衰）、格鲁格（寻租理论）、威廉姆森（交易费用促使企业与市场相互替代）等学者理论体系的思想源泉。

阿里斯在很大程度上是旧制度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经济分析“必须在一般文化层次而不是个体层次上进行”这一凡勃伦传统，坚持凡勃伦技术促进制度变迁的观点，并使这一观点成为“经济分析的总原则”，认为技术“具有内在的渐进性，而且是社会变迁的动因”^①。阿里斯将凡勃伦的技术概念延伸至包括所有有实际效果的知识，于是，制度变迁本身就包括了带来制度的技术进步，从而阐述了二者之间相互推动的关系；他倾向于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或集体选择的“民主决策”过程，这又与康芒斯的观点相近。值得一提的是，阿里斯对“文化力量”和“真实价值”倾注了很大的关注，他认为技术进步是“被它自己的内

参见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 162 页。

在动力所引导的文化过程”，“是一个跟经济刺激、社会需求或个体创造者的创造性基因极少有关系的过程”^①；而“真实价值”则是“在技术连续统一体及生命过程的维护和推进中可以证明的效率问题”^②，一切经济过程和制度变迁必须以之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阿里斯的这种观点与后来诺斯（1979）对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视正可相互印证。

缪尔达尔是一个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是瑞典学派的重要继承者，他被视为制度主义学者，主要是因为他运用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他认为，在动态社会中，社会各因素间存在着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将引起另一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动；第一级的变动，又将引起第二级的变动，从而使变动累积持续下去。缪尔达尔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了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横向关系）和前后事件变迁的互为因果关系（纵向关系），并把其着重点放在制度这一层面。他认为，制度安排的变动一般会引起两种反应：抗衡性变动（Countervailing Change）和支持性变动（Supporting Change），二者的消长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而二者的力量对比又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即初始变动能否形成自增强（正反馈）作用机制^③。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与凡勃伦的“累积因果”观点正相契合，而其对制度变迁的描述和对初始条件的强调则又与诺斯的路径依赖思想息息相通。

希尔（1989）、戈登（1980）转引自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49页。

②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第163页。

③ 参见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第436—438页；杜朝运：《中国过渡金融论》第11—12页。